

戊戌宣传健将笔锋常带感情
采访近代美国鼓吹变法维新

梁启超

新大陆游记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K971.29/1

走向世界叢書

新大陆游记

梁启超著 何守真校点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00524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800524



新大陆游记

梁启超 著

何守真 校点

责任编辑：钟叔河

装帧设计：易 地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14,000 印张：6.5 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11109·174 定价：0.62元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总序

人们常说，今天的世界，是一个“迅速缩小的世界”（rapidly shrinking world）。在电视卫星、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，地球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，好象越来越短；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交流，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。

可是，仅仅在几代人以前，“异国”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。古代欧洲人说，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，喂到第五年虫肚子涨裂开，就从里面取出丝来（波桑尼阿《希腊纪事》Ⅷ.XXⅧ.6—9）。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，西方有的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，脐带还连着大地（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拂菻一节，清代康熙朝御制《渊鉴类函·边塞部九》）。这类“海外奇谈”，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；而在过去上千年中，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，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。由此可见，人类文明的发展，确实是经历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。

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，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。象纪念伟大的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教育家一样，历史将永远铭记着张骞、玄奘、鉴真、郑和、马哥波罗、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。可以这样说：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，往往也就

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。

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。当黄河、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，泰晤士、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，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。而自文艺复兴、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，中国却渐渐地落后了。在西欧（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）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，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。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，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，林则徐首当其冲，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，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外国隔开了。

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，在“严夷夏之大防”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许多年。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？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学鸵鸟。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，见到“洋人”就“以扇蔽面”。庚子年间他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“杀尽洋人”，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，自己的命却送掉了。林则徐、魏源等则不同，提出了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，那就是：学习外国的长处，来对付外国的侵略。要学习，先得了解，于是林则徐编了《四洲志》，魏源编了《海国图志》。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去考察，书的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，难免有许多谬误。但无论如何，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。

林则徐、魏源之后，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，到欧美日本去学习、游历和出使。容闳1847年留学美

国，斌椿、张德彝等1866年游历欧洲，志刚、孙家谷1868年出使泰西，这是最早的。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，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去的政府官员，但一去就不会不接近（现）代的科学文化、政治思想，也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。

《走向世界》这部丛书，收的就是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国的观察和感想。“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，先进的中国人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。洪秀全、康有为、严复和孙中山，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。”（毛泽东：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）丛书以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为主。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，但所处地位重要，写的书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兴味，只要在政治和涉外方面没有严重问题，也酌予收录。

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，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，值得中国人学习。但是，资本主义的本质，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。中国人走向世界、接触西方，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，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。盲目排外的情绪是有的，盲目崇外的情绪也是有的。对于某些作品中流露的这类观点，我们为这套丛书撰写的评介文章，将适当地作些分析，请读者注意。

“洋为中用”是我们今天的主张，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。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，不也是“洋为中用”吗？当然，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，人们慢慢地看出：仅

仅学一点“长技”，搞一点坚船利炮，还是不行的。“要救国，只有维新”，维新行不通，就只有革命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，“始见轮舟之奇，沧海之阔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，穷天地之想”，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。历史无情亦有情，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，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，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。

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已经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。但是，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，我们的经济、科学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。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，走向世界。打开眼界以后，还要学会分析，分清好的和坏的。一切好的东西，要“拿来”为我所用；一切有害的东西，要实行抵制和预防。在这方面，前人的观察和体会，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。

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，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、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。希望它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，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。是为序。

编 者

一九八〇年七月

“海云凝望转低迷”的“新大陆”

——从《新大陆游记》看梁启超的政治思想

钟叔河

戊戌政变后第六年之初，作为《新民丛报》临时增刊的《新大陆游记》，一发表就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，因为作者梁启超在戊戌前后实在太有名了。郭沫若在自传中说：

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。……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，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、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，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。二十年前的青少年，……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。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。

然而，《新大陆游记》却不是一本鼓吹革命的书。它集中反映了梁启超政治思想上的矛盾：一方面，痛切感到专制桎梏下中国的落后，承认资本主义对于封建制度的巨大优越性；另一方面，又害怕革命的暴烈行动，顾虑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。原先他在《二十世纪太平洋歌》中，曾将美国誉为“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”；而当他真要横渡太平洋去美洲时，情绪却显得低沉起来：

庄严地岳来何暮，刍狗年华住且佳；
一事未成且中岁，海云凝望转低迷。

“海云凝望转低迷”。这时的梁启超已经丧失了“新兴气锐”的革命豪情。他“凝望”着“庄严地岳”的新大陆和自己古老祖国的前途，都不免有一些看不清方向了。

* * *

梁启超有个最大的特点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”。他的思想和观点总是在变。这既是他的优点，也是他的弱点。

十八岁以前的梁启超，是封建科举制度下一个敏而好学、少年得志的年轻士子。他十二岁考取秀才，十七岁又考上了举人。大家知道，《儒林外史》里范进中举时，已经五十多岁。范进中举，一“举”就有了钱，有了势。梁启超十七岁中举，用老眼光看，他是“前程无限”的。

可是，从西方传来的“新学”，把梁启超的思想引上了一条新的道路。由于偶然的机会，他在书肆里看到了一部《瀛寰志略》，这是中国近代较早系统介绍世界知识的一部书。从此他知道了，在十三经、廿二史所说的“四夷八荒”之外，还有一个如此广大的、多样化的世界。他的思想立即为之一变，决心要寻求更多的新知识、新道理，结果找到了正在广州“万木草堂”大讲新学的康有为。

关于“康梁”的首次见面，梁氏在他《三十自述》一文中有一段生动的叙述：

时余以少年科第，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颇有所知，辄沾沾自喜。先生乃以大海潮音，作狮子吼，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，更端驳诘，悉举而摧廓清之。自辰入见，及戌始退。冷水浇背，当头一棒，一旦尽失其故垒，惘惘然不知所从事。……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，而并及史学、西学之梗概，自是决然舍去旧学，……

于是，从1891到1893年，他在“万木草堂”学习和研究了三年。先是听康有为讲述中国的学术、历史、政治，“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”，“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”。后来并且成了康有为著书立说的重要助手，校勘《新学伪经考》，分纂《孔子改制考》，为大规模学习西方制造理论根据。

* * *

甲午战争失败，洋务运动破产。顽固分子日暮途远、倒行逆施，有识之士忧惧危亡、痛心疾首。“万木草堂”所讲求的“经世致用之学”，这时真正到了要经世致用的时候。“康梁”双双从广东进京。在“马关条约”即将签字时，他们在齐集北京会试的各省一万数千名举人中发起联名上书，向清政府请求：一、拒和；二、迁都；三、变法。这就是有名的“公车上书”——近代史上有声有色的变法维新运动的起点。

梁启超有“训诂词章之学”的根柢，有从“万木草堂”学到的“史学、西学之梗概”，又有一支“笔锋常带情感”的凌云健笔，自然成了维新派的首席宣传家。他大声疾呼要“变”：

……凡在天地之间者，莫不变。……大地既通，万国蒸蒸日趋而上，大势相迫，非可阂制。变亦变，不变亦变。（《变法通议》）

他大声疾呼要“革”：

“革”也者，含有英语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。……Revolution之事业（即日人之谓革命，今我之谓变更），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法门。（《释“革”》）

他大声疾呼反对专制政体：

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，破碎而齑粉之，使数千万如虎如狼、如蝗如螽、如蛾如蛆之官吏，失其社鼠城狐之凭藉，……（《新民说》）

他大声疾呼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：

盖地球之运，将入太平，固非泰西之所得专，亦非震旦之所得避。吾知不及百年，将举五洲而悉唯民之从，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。

善夫！立宪国之政党政治也！（《新民说》）

这些“若有电力足以吸住人”（郑振铎语）、“很能打动一般青年人的心”（周启明语）的文字，讲出了“当时人人所欲言而迄未能言”的道理，“影响当然是极大”的（郑振铎：《梁任公先生传》）。

*

*

*

“万国蒸蒸日趋而上”的形势，“Reform与Revolution”的历史，“立宪国之政党政治”的现实，都是从西方传播到梁启超思想里来的东西。梁启超以此为武器，批判腐朽的

封建专制主义，确实如狂风之扫败叶，使他博得了进步的美名。但是，西方的影响并没有改变梁启超“书香门第”出身的读书人不相信人民群众的本质，也没有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。

就在1896年写的《变法通议》、1902年写的《新民说》这些著名的进步文章中，梁启超也用悲天悯人的口吻，不止一次地讲到中国人民“私德”、“公德”的缺陷，并且认为这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得以长久维持的重要原因。比如说“我国民所最缺者，公德其一端也”。“耗矣哀哉，吾中国之无国家思想也。”“吾民自数千年祖宗之遗传，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。”“群四万万无法律之人而能立国，吾未之前闻。”“悲哉，吾中国人无自尊性质也。”等等等等。

梁启超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。他把专制统治在人民身上造成的恶果，颠倒当成了维持专制制度的根源。这样，他所设想的变革，就不是依靠四万万人起来打掉封建枷锁，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而是由少数圣贤豪杰自上而下地来改造教育四万万人成为“新民”。这当然是一个根本的错误。

*

*

*

只有弄清了梁启超的这个根本观点，才能够理解：为什么这位和康有为齐名的变法运动领袖人物，在轰轰烈烈的变法活动中，却只参加了“办大学堂、译书局”这样一点点实际工作？为什么他明明知道需要将旧政体“破碎而齑粉之”，却又把“内乱”当做“最不祥物”来反对？为什么他明明知道“数千万如虎如狼”的官吏是专制制度的基

础，却又说“办一切事舍官莫属”？为什么他明明知道“国之强弱，悉推原于民主”，却又说“今日民义未讲，则无宁先借君权以转移之”？为什么他自己“日与人言西学”，却又说“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，而中学将亡之为患”？

在封建专制主义面前，是“一个革命家的代表”；在四万万人民群众面前，却又是一个害怕暴力革命的读书人。这正跟明明对一切事情都很热中，偏要自号为“饮冰室主人”一样，是在用折中的言词掩盖思想的矛盾，用过正的议论求得态度的折中。这就是梁启超的逻辑。

关于这一点，梁氏本人在给严复的一封信中有很坦率的自白：

启超于学，本未尝有所专心肆力，……当其论此事也，每云必此事先办，然后他事可办；及其论彼事也，又云必彼事先办，然后余事可办。比而观之，固已矛盾，……抚以自问，亦自笑其欺人矣。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土阶之言，因不复自束，徒纵其笔端之所至，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，故习焉于自欺而不觉也。

既承认了“自欺”，也承认了“欺人”，承认了自己论点“固已矛盾”；但梁启超把它归因于“于学本未尝有所专心肆力”和“不复自束，徒纵其笔端之所至”，就未免仍旧有点自欺欺人了。

* * *

总的情况是，从甲午到戊戌（1894——1898），梁启超大力宣传变法维新，起到了“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

代言者”的作用；从戊戌到癸卯（1898——1903）新大陆之游，他鼓吹变革的宣传显著地少了，从学术、文化、史地、人物的角度来做的启蒙工作多了，但起的作用主要仍然是积极的；而“自美洲归来后，言论大变，前所深信之破坏主义与革命的排满主义，至是完全放弃”（见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），到乙巳（1905）年发表《开明专制论》的梁启超就完全站到反对革命的立场上去了。

《新大陆游记》是梁启超政治上即将离开进步营垒时的“临别纪念”，是他思想上的矛盾发展到顶点时的一篇自白，无论对于研究从戊戌到辛亥这个时期的历史，或者对于研究梁启超，这个历史人物，都有它一定的价值。

这是一本精华与糟粕互见、但精华仍多于糟粕的书。对于其中的错误，我们将把它们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批判。但通观全书，作者仍然在以下三个方面宣传了有意义的东西：

（一）宣传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巨大优越性，宣传了美国革命独立后短短一百余年中的突飞猛进，这就等于用事实继续宣传了在中国实行变革的必要性。

（二）介绍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状况，对当时闭目塞听的国人起了启蒙的作用。

（三）从一定的角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弊病。

*

*

*

美国是一个后来居上的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。梁启超

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，第一次从东方来到美国，对于美国建国一百余年来所取得的巨大进步，确实深有所感。

《新大陆游记》（以下简称《游记》）第8节叙述：“纽约当美国独立时，人口不过二万余（其时美国中一万人以上之都市仅五处耳）。迨十九世纪之中叶，骤进至七十余万。至今二十世纪之初，更骤进至三百五十余万，……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，则目眩于视察，耳疲于听闻，口吃于演述，手穷于摹写，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。”第13节又说：“从内地来者，至香港、上海，眼界辄一变；……至日本，眼界又一变；……渡海至太平洋沿岸，眼界又一变；……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，眼界又一变；……至纽约，观止也未？”

《游记》第九节记美国各大公司，资本总额合“上海、香港通用银九十万万有奇，……其气象之伟大，真不可思议、不可思议！”第10节记美国工业进步，“1860年英国所产工业品之金额每人平均九十五元，其年美国所产之工业品之金额每人平均不过五十九元”，而1900年美国每人平均百七十一元有奇，英国则每人平均百二十元耳。第15节记大企业家摩尔根，其所控制之铁路“足以绕地球四周而有余”，其资本“当中国政府二十年之岁入”。第28节记太平洋海底电线告成，有线通信十二分钟即可环绕地球一周，莎士比亚在三百年前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。第34节记横贯美洲大陆的“大北铁路”修成后，“数千里之荒原不十年间而千数之大村落、百数之大城市弹指涌现，岁岁产七千万

石以上之小麦供给世界市场，其余物产亦称是。至今全世界农业制度最完美之区，惟此为称首。”

梁启超兴致勃勃地介绍了美国的建设成就，他的结论很明确：

成功自是人权贵，
创业终由道力强。

（第二十七节《独立纪念日》）

“道力”下面有条原注，说明指的是“共产自治团体规则”十三章。主观上不赞成革命、共和的梁启超，客观上却不能不承认革命、共和是“创业”“成功”的根本保证，而为之大唱赞歌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革命、共和的强大生命力的明证。

*

*

*

八十年前的“新大陆”，对于正在经历戊戌政变后黑暗时期的中国人来说，确实是一个新的世界。《游记》介绍的那里的情况，许多是足以使过去闭目塞听的人深思猛省的。

游华盛顿时，作者见到“全都中公家之建筑，最宏敞者为国会（即喀别德儿），次为兵房，次为邮局，最湫隘者为大统领官邸”。“观此不得不叹羨平民政治质素之风，其所谓平等者真乃实行，而所谓国民公仆者真丝忽不敢自侈也。于戏，倖乎远矣！”

作者论述美国政治，介绍了美国的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，并引卢梭、波伦哈克的话，说这种不同于中央集权的

政体，是实行民主共和的要素之一。接着又介绍了美国的两党政治，结论是“美国卒以此两者之相竞争相节制相调和，遂以成今日之治。”在另一章中，又愤慨地提到“现时中国政府”（指戊戌政变后的清政府）之“摧锄新党”。一贬一褒，用意十分明显。

《游记》以整整一节叙述了“前世纪与今世纪之交”新出现的一大“怪物”——托辣斯，列举了它的十二利和十弊。作者既看到了托辣斯对于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危害，也指出了企业联合、资本集中对于发展生产的巨大作用，是不可避免的趋势。梁启超的根本思想仍然是要“冲破”阻碍资本主义大生产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。

在华盛顿、波士顿、费城等地，作者访问了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的历史遗迹。他在记述“新世界石”时，歌颂了初到美洲的101位英国人“苦英苛政”、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。在游览1775年4月民兵和英军交战的古战场时，又作诗云：

生命固所爱，不以易自由。
国殇鬼亦雄，奴颜生逾羞。
当其奋起时，磊落宁他求。

.....

谓是实天幸，人谋与鬼谋？
谓是某英雄，只手回横流？
岂识潜势力，乃在丘民丘。

这里仍然强调了人民群众（丘民）的“潜势力”作用。梁启超和从根本上敌视人民群众的西太后、袁世凯之流，毕竟是